

双重叙事进程下《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的反边缘化身份研究

马楚涵

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要

佐拉·尼尔·赫斯顿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 她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被视为非裔女性文学经典。《他们眼望上苍》以珍妮第一人称叙述展开, 通过其三段婚姻揭示了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多重压迫。文章从申丹教授的双重叙事进程视角分析珍妮对其边缘化身份的反抗, 探寻在表层婚姻叙事的显性压迫之下, 珍妮的自我意识觉醒与隐性的反抗, 通过双进程的互动, 从而揭示黑人女性在多重压迫下重建主体性的独特路径。研究发现, 珍妮的反边缘化身份贯穿于显性进程的层层压迫与隐性进程的持续反抗之间的动态张力之中; 她最终通过向菲比讲述自己的故事, 完成了从被书写的客体到掌握叙事权威的主体的终极转变。

关键词

《他们眼望上苍》, 双重叙事进程, 反边缘化身份, 压迫与反抗, 隐喻叙事

A Study on Janie's Resistance of Marginalized Identity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under the Dual Narrative Processes

Chuhan M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March 11, 2026; accepted: April 16,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Zora Neale Hurston was one of the prominent African American female writers during the Harlem

Renaiss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 masterpiece,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is regarded as a classic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unfolds through Janie's first-person narration, exploring the complex oppression faced by black women under patriarchy as depicted through her three marriages. This paper analyzes Janie's resistance against her marginalized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or Shen Dan's dual narrative processe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beneath the overt oppression of superficial marital narratives, Janie's awakening self-awareness and covert resistance interact through a dual-process dynamic. It thereby reveals the unique path through which black women reconstruct their subjectivity amidst multiple oppres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Janie's resistance of marginalized identity unfolds within the dynamic tension between the oppression of the explicit process and the persistent resistance of the implicit process. Ultimately, by telling Phoeby her own story, she completes the ultimate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bject of narration to a subject who wields narrative authority.

Keywords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Dual Narrative Processes, Resistance of Marginalized Identity,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Metaphorical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他们仰望上苍》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长篇小说。自1970年代艾丽斯·沃克等学者重新发掘后，被确立为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

这部作品的表层叙事是以黑人女性珍妮的三段婚姻为线索展开的，但在表层的婚姻叙事之下蕴含了黑人女性在多重压迫下重建主体性的独特路径——珍妮从被叙述的客体，逐步争取话语权，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言说的主体。

在当代叙事学领域，申丹教授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构成了重要的范式突破。该理论超越了传统叙事学对单一情节发展的关注，指出在许多优秀的叙事作品中，存在一种与情节发展并列运行的“隐性进程”。这一隐性进程自始至终与显性情节形成对照、颠覆或互补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作品的动态整体。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为显性叙事与隐性叙事精妙结合的典范，但当前的研究明显不足。

2. 理论背景：双重叙事进程和隐喻叙事

2.1. 双重叙事进程

“双重叙事进程”是申丹在国际叙事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念，指一个作品中由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所构成的双重叙事运动[1]。也就是说，许多叙事作品存在两条叙事的“线”：一条为显性情节进程，由作品的故事情节发展构成；一条为隐性进程，通过细节、意象、语气、对话等更隐蔽的文本手段建构，常对显性进程形成补充、对照或颠覆。两条叙事“线”相互交织，共同表达作品丰富的主题意蕴与审美价值。

申丹曾提出与情节发展相对、易被忽略的“隐性进程”概念[2]，并指出某些叙事作品中存在交织并行的“双重叙事动力”[3]，共同构成“连接情节头尾和推动其中部发展”的力量[2]。也就是说，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隐性进程并非情节的附属，而是一个独立、完整且连贯的叙事动力系统。它潜藏于文本

深层，要求读者超越情节中心的阅读惯性，主动关注语言细节、叙事技巧与情感基调的微妙变化。双重叙事进程间可能形成相互强化、紧张对立或反讽解构等复杂互动，从而拓展文本意义层次，揭示潜藏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心理维度的隐性话语。

2.2. 隐喻叙事

Musolff 提出了隐喻情节概念，即能为目标域的概念化提供聚焦点的、构成叙事情节的隐喻交互[4]。隐喻叙事是通过象征表达传递深层意涵的叙述手法。其核心在于以具象意象或情节要素为载体，隐晦传达抽象主题、情感或社会批判，从而建构超越字面意义、可多向解读的叙述空间。

该方法主要特征体现为意义表达的间接性与开放性。其表述常具模糊性与多义性，不同文化背景或历史语境可能衍生相异的阐释路径。

3. 文献综述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对《他们眼望上苍》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到经典化的过程。小说 1937 年出版之初，因不符合当时黑人文学的传统，遭到理查德·赖特“无主题、无信息、无思想”的尖锐批评。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艾丽丝·沃克的重新发掘下，赫斯顿的文学地位得以复兴。此后，女性主义批评成为主导视角，学界聚焦于珍妮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身份建构；同时，巴赫金对话理论、神话-原型批评等也被引入研究，有学者指出赫斯顿通过伊西斯-奥西里斯神话解构了男性权威与西方中心主义。近年来，新历史主义、空间政治学等多元视角不断拓展着该作品的研究疆域。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他们眼望上苍》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为引介期，以作品译介和作家生平介绍为主；21 世纪前十年为发展期，研究成果显著增加，女性主义、叙事学、文化人类学成为主要批评范式，学者们关注珍妮的自我身份追寻、黑人方言与民俗传统的文本表征；2010 年至今为深化期，研究视角日益多元，成长小说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空间政治学等被相继引入。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赫斯顿“双合种族意识”与“种族健康”等创作哲学，突破了对文本的单维度解读。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呈现出从单一视角向多维整合、从文本分析向文化批评拓展的趋势。

4. 显性进程中的压迫：三段婚姻中珍妮的身份困境

4.1. 与洛根·基利克斯的婚姻：物质控制下作为财产的“劳作工具”

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5]而珍妮出生在一家白人的后院里，由祖母抚养长大，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六岁的一天，珍妮看到了自己和其他四个白人孩子的照片，可是她认不出自己，“我本该在这个地方的，可是我认不出那个黑孩子是我，因此便问道：‘我在哪儿？我看不见自己’”[6]。由此可知，这是珍妮与生俱来的身份困境。

珍妮的首次婚姻由祖母安排，嫁给了拥有六十亩地的洛根·基利克斯。这段婚姻本质上是为获得物质保障的利益交换，是对黑人女性身体和劳动最原始的物质性控制。

首先，压迫直接表现为身体的客体化与工具化。洛根视珍妮为财产与劳动力，明确要求她协助经营农田，将她束缚于繁重的农务与家务之中。洛根将其视作“骡子”，这一核心隐喻将黑人女性与非人的生产工具等同，揭示了在特定历史经济条件下，黑人女性的身体如何被剥夺人性，沦为维系与增殖物质

资产的工具。

其次，压迫表现为对自主意志的彻底否定。祖母的安排源于自身受奴役时期遭受性剥削的创伤记忆，她将土地所有权视为黑人女性唯一的“庇护所”。然而，这一以物质保障为名的安排完全无视珍妮内心对爱情、自我实现与精神共鸣的渴望。当珍妮表达不满时，洛根以威胁与进一步的物化回应：“你以为你是谁？要不是你祖母，你什么都不是……我用斧头收拾你”[6]。言语侮辱与暴力威胁强化了其基于财产权的支配地位。珍妮最终的出走不仅是对洛根个人的反抗，更是对一种将其贬低为物质交换媒介的压迫逻辑的决裂。

此阶段她的身份困境在于：在追求物质保障的同时，自身却被异化为保障他人物质利益的工具。

4.2. 与乔·斯塔克斯的婚姻：权力操控下被凝视的“镇长夫人”

珍妮的第二次婚姻始于对浪漫与社会阶层跃升的渴望，她与野心勃勃的乔·斯塔克斯私奔至黑人小镇伊顿维尔。然而这段婚姻迅速演变为一个更精致却令人窒息的权力牢笼。压迫形式从粗陋的物质控制转向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凝视规训。

“身份塑造”除了包括主体自我选择的各种塑造外，就其政治意义而言，主要体现为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强制性塑造或规训[7]。乔立志成为伊顿维尔的镇长，并将珍妮塑造为其权力工程的核心象征与装饰品。

压迫首先体现为对公共形象的严格控制与话语权的剥夺。乔禁止珍妮在公众场合参与粗俗谈话，要求她扮演高雅疏离的“镇长夫人”角色。当他在店铺门廊发表演讲时，珍妮必须静坐高处，成为供人群凝视的静态景观而非对话参与者。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珍妮受邀向人群分享趣闻时，乔厉声打断：“我妻子不擅公开讲话。她是女人，她的位置在家庭”[6]。此言明示了公共话语权与性别角色的捆绑。

其次，压迫表现为身体与年龄成为凝视与控制的焦点。乔强迫珍妮以头巾包裹长发，这一压制生命力与女性魅力的象征之举，不仅出于嫉妒，更是对其身体自主权的剥夺——他将珍妮的身体部位定义为需隐藏的、仅属其私有的秘密。随着乔权力巩固与年岁增长，他通过贬损珍妮的年龄与外貌来维持失衡的权力关系。其建立的店铺门廊成为权力剧场的缩影：他坐镇椅中统御全局，珍妮则被禁锢于柜台后或室内。

珍妮的身份困境在此显现：在追求阶层上升的过程中，她自身被物化为地位象征，其主体性在持续凝视与言语压制中逐渐消解。最终她在公众面前揭露乔衰老无能的场景，正是击碎其被凝视客体地位的决定性反抗。

4.3. 与甜点心的婚姻：平等表象下依附他人的“精神追随者”

珍妮的第三次婚姻是她与年轻不羁的甜点心的结合，表面上打破了她前两次婚姻的压迫模式，但实际上，即使在这段被珍妮视为实现其“梨树”梦想的关系中，仍潜藏着微妙而深刻的压迫形式。这些压迫以权力失衡和情感依赖风险的形式存在，并被浪漫理想主义与相互情感碰撞所掩盖。

甜点心教授珍妮纸牌、钓鱼等游戏，将她带入大沼泽的集体劳动生活，赋予了她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快乐。但压迫以更隐蔽的方式运作：首先，关系主动权由甜点心主导，珍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追随者。甜点心对珍妮的爱掺杂着强烈占有欲，以及将她从优越地位拉下的冲动。他鼓励珍妮劳动，不仅是出于对伴侣的期望，还是为了消除他人对其动用珍妮财产的猜疑，并使她融入自身社交圈。虽然珍妮继承了乔的财产，但甜点心坚持工作，以此强调其作为供养者的男性气概，这本身即是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妥协。

其次，珍妮以甜点心的生活轨迹为生活中心，以他的价值判断为自我准则，呈现出主体性的隐性让

渡。珍妮坦言：“是甜点心让我穿上的——好跟着他”[6]，这一细节揭示其以对方喜好重塑自我的倾向；而她关于“如果你能看见黎明的曙光，那么黄昏时死去也就不在乎了”[6]的深情表白，虽饱含爱与满足，却也隐喻了其自我实现与甜点心的生命已然深度捆绑、甚至愿意为此消弭自我的精神依附状态。

在飓风中，甜点心被疯狗咬伤后感染狂犬病，在癫狂中向珍妮开枪，迫使她开枪自卫，将其杀害。珍妮为保全自我而终结爱人的生命，揭示了她最终摆脱了任何形式的男性定义，但也以最痛苦的方式证明，在压迫结构根深蒂固的社会中，纯粹、无权力且完全平等的爱情仍无法实现。

5. 隐性进程中的觉醒：隐喻叙事下的个体反抗

5.1. 褪下“围裙”：反叛被物化的工具性身份

在珍妮的第一段婚姻中，“围裙”象征着洛根强加于珍妮的工具性身份：她是承担家务劳动、生育职责的功能性存在，无需情感回馈。当洛根命令她系上“围裙”，从事繁重农活时，“围裙”成为其被物化与主体性被剥夺的外在标志。

珍妮的觉醒始于对这种物化的本能的拒斥。通过观察梨花与蜂群，她朦胧地意识到两性间应有的相互吸引与成全，这与她被当作工具对待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最终，当更具魅力的乔·斯塔克斯出现并许诺浪漫与远方时，珍妮毅然褪下洛根强加的“围裙”——逃离了第一段婚姻。此举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离开，更是她对非人化处境的首次反抗，拒绝继续扮演无情感、无欲望的劳动工具。尽管前路依然充满未知与风险，褪下“围裙”标志着她夺回自我定义权的首次主动实践，是其从被动客体走向主体追寻的起点。

5.2. 解开“发带”：突破话语禁锢的困境

在珍妮与乔·斯塔克斯的婚姻中，乔强迫珍妮在店铺中束起长发、佩戴“发带”——这一象征至关重要。此举不仅压制了她那引人注目的长发所象征的野性生命力与女性魅力，更隐喻着乔对其言论及社会交往的全面控制。“发带”在此成为规训与禁锢的象征：乔要求珍妮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将她的声音与思想紧紧束缚。珍妮的美貌得以展示，但其内在的自我表达却被禁止。

珍妮的反抗经历了从隐忍到爆发的演变过程。她最初将真实的自我隐藏于沉默之中，但其内心的言语世界持续生长。随着乔日益年迈与专横，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一次公开羞辱事件后，珍妮于激烈的言语交锋中当着众人之面悍然解开“发带”，让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声音”是女性表达地位和权利的能指，用以消解男权话语霸权的逻格斯中心[8]。因此，这一举动标志着她公开挣脱了乔的语言霸权。解开“发带”象征着打破言语束缚与审美规训，释放被压抑的声音与女性魅力。对珍妮而言，此举是击碎言语枷锁、夺回自我表达权的关键战役，为她最终追寻自身主体性奠定了基础。

5.3. 穿上“工装裤”：打破固化的性别分工

与甜点心的婚姻标志着珍妮进入了完全觉醒并实现平等关系的阶段。在这段关系中，“工装裤”成为核心的平等象征。当珍妮追随甜点心到沼泽营地时，她特意穿上“工装裤”与甜点心一同参与农活。这一举动彻底颠覆了她前两段婚姻中僵化的性别分工：与洛根一起时，她是被迫劳作的工具；与乔一起时，她是被供养展示的饰品。而“工装裤”在此象征着自主、平等与共同经历。

珍妮穿上“工装裤”并非出于被迫或命令，而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与爱人分享生活的每一面。她与甜点心一同劳作、钓鱼、抵御飓风。“工装裤”抹去了传统性别分工的界限，标志着珍妮从一个被局限在私人领域、依附他人的女性，蜕变为能够进入公共生产领域、与男性并肩协作的完整的人。甜点心不仅接受更鼓励珍妮的越界行为，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平等基础上。

穿上“工装裤”是珍妮对刻板的性别分工最彻底最具体的反抗。它宣告了珍妮不仅在情感与话语中，更在社会经济活动和生存能力上确立主体性的决心。在故事结尾，历经风暴，珍妮带着平静与坚毅回到小镇。她带回的是一个完整的、自足的、富有故事的且拥有独立精神的自我。

6. 双进程的合流：叙事主体性的生成与反边缘化的身份的建构

6.1. 显性的压迫催化隐性的反抗：从被动承受走向主动抉择

在故事的开端，珍妮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制度化压迫的世界中。最突出的是她的祖母强加给她的生存哲学——这种植根于奴隶制对黑人女性造成的创伤的理念将物质保障置于爱情之上，实质上将黑人女性贬低为需要“安置”的财产。随后，在她的三段婚姻中，压迫以更具体的形式呈现。这些显性压迫——被物化，声音被剥夺，以及主体性丧失——构成了珍妮生活的表层叙事，而她最初也扮演着被分配的角色。

然而，正是在这种显性压迫的裂隙中，隐性抵抗开始悄然生根。这种抵抗最初并非公开反抗，而是表现为内在的意识的觉醒与自然意象编织的隐喻。珍妮幼年在梨树下的幻想，成为了她对爱情与自我实现最深层的渴望，最终也成为了她能够反抗充满压迫的婚姻的内部驱动力。当受到乔的公开羞辱时，她开始学会在内心评判他——这是一种叙事意识的初步觉醒。她开始编织内在的、不同于外界强加版本的个人叙事。在乔死后，社会主流话语将珍妮叙述为一个矜持、高傲的黑人寡妇，但她享受自由的生活[9]，她坦率地对好友费比说：“让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6]。她没有陷入被叙述的圈套，不在乎他人的看法，而是成功地建立自我叙述，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目的，掌握话语的主动权[9]。

任何一种主体的建构，任何一种主体间性的形成，任何一种身份建构的行为，都不能不涉及他者，都不能不借助他者。没有他者，主体建构是不可能的，也就不可能有主体[7]。因此，正是珍妮在生命中所遭遇的这些压迫以及压迫着她的“他者”，共同催生出了珍妮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勇敢坚毅的反抗。

6.2. 隐性的觉醒重塑显性的规训：从内在突破走向叙事权威

与甜点心的婚姻是珍妮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象征着其长期潜藏的觉醒意识突破临界阈值，开始主动重塑外在生存境遇并实现话语实践。

嫁给甜点心的决定受到朋友的指责时，珍妮说：“我按外祖母的方式生活过了，现在我打算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了”[6]。以前的珍妮一直处于被叙述的状态，遇到甜点心以后的珍妮可以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内心长期压抑的自我——那株“开花的梨树”——获得了实质性的滋养与认同。

这种内在完整性推动珍妮主动争取并行使叙事权威。更根本的转变在于她与甜点心的关系颠覆了男性主导的规训体系。她与甜点心共赴大沼泽地、加入流动农耕社群的行动，象征其自觉脱离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进入更加流动的平等的空间。在此空间中，她不再是“劳动工具”“市长夫人”，而是通过劳动、歌声与故事讲述与他人建立联结的独立个体。她终于从被他人叙事定义的女性，转变为以行动书写自我故事的主体。

6.3. 双进程的互动实现身份的超越：从被述客体走向人生主人公

小说本身的环形叙事结构，是珍妮身份超越的最终证明。故事以珍妮的回归为开端，通过她对朋友菲比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展开，并以“于是他们的眼望上苍”[6]这一箴言作为结尾。这一叙事设计至关重要：珍妮的叙述行为本身成为了珍妮身份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或者说，珍妮主动讲述自己的经历的行为标志着珍妮自我意识觉醒的完成。

珍妮不再是被社区流言随意涂抹的客体，她主动选择了听众菲比，将碎片化却丰富的经历编织成连贯整体。通过讲述，她阐明自卫打死甜点心并非罪行，而是爱与绝望中诞生的必然选择，从而重获对这

一关键事件的解释权。她重新界定三段婚姻并非一连串失败，而是自我发现的必要旅程。在叙述中，她调动黑人女性口述传统的力量，将个人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共鸣的寓言。

最终，通过双重叙事进程的交织，珍妮实现了身份的超越。她既经历了外部社会结构的压迫与变迁，又完成了内在自我认知的旅程——从沉睡接受到觉醒表达。完成叙述后，她不再需要外界的定义或认可。她将自己从被社会叙事边缘化的“他者”，重塑为叙事主体，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唯一作者与主角。她探索出了一条反边缘化并建立主体性的独特路径：承认痛苦与压迫的历史与现实，却拒绝被其影响；从黑人女性独特的文化资源与个人经验中汲取力量，最终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7. 结语

《他们眼望上苍》为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具阐释潜力的理想范本：显性社会压迫与隐性内在反抗之间的张力推动叙事发展，而内在觉醒最终通过叙事行为重构外部现实与自我认知。珍妮的故事证明，真正的解放始于内心的无声低语，经由勇敢的生活实践而实现，并最终通过牢牢掌握叙事主动权、向世界言说自己的故事而得以完成。

总而言之，《他们眼望上苍》通过显性进程中的三重婚姻压迫与隐性进程中的三重反抗意象，构建了推动珍妮身份演变的双重叙事动力。二者之间的互动不仅描绘了珍妮从被规训的客体蜕变为自我叙事的主体的成长轨迹，更深刻揭示了黑人女性在种族、性别与阶级等多重压迫交织下所开辟的自我觉醒的独特道路。

参考文献

- [1] 阮诗芸, 申丹. 赋的双重叙事进程英译研究[J]. 外国语文, 2024, 40(2): 76-85.
- [2] 申丹. 西方文论关键词隐性进程[J]. 外国文学, 2019(1): 81-96.
- [3] 申丹. “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J]. 外国文学, 2022(1): 62-81.
- [4] Musolff, A. (2006) Metaphor Scenarios in Public Discourse. *Metaphor and Symbol*, 21, 23-3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2101_2
- [5] 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J]. 外国文学, 2004(2): 37-44.
- [6] 赫斯顿. 他们眼望上苍[M]. 王家湘, 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 [7] 陈永国. 身份认同与文学的政治[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1(6): 22-31.
- [8] 黄必康. 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J]. 国外文学, 2001(2): 117-120.
- [9] 左悦. 《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的身份认同研究[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19): 49-52.